

##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倪世雄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它不仅给国际关系格局带来了根本的变革,而且还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本文将重点探讨二次大战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产生的影响,介评战后早期的主要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观点。

### 一

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在一次大战以后才逐步形成的。最初,研究的中心在欧洲。1919年在英国威尔士大学首先开设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讲座和课程,设立了最早的国际关系教授职称。此间,刚结束的一次大战给人类带来空前浩劫,使不少学者转向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和十九世纪的理性主义,提倡道德准则,主张国际法制,稳定国际社会,以避免一次大战的悲剧重演。于是,国际关系理论的理想主义学派应运而生,并从20年代至30年代末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处于优势地位。

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和二次大战前笼罩在欧洲上空的战争乌云使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者转而认为,人类应当正视争斗现实,而不应陷入和谐的空想;他们提出,外交目的应是在国际舞台上攫取权势,国际关系应以实在的“权力”和“国家利益”为中心,而不是以抽象的“道义”和“民主”为轴心。现实主义这一最初发展的标志是193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教授E·H·卡尔发表的《二十年危机——国际关系研究导论》。卡尔从分析1919年至1939年二十年间的新的战争危机出发,在批判当时

占优势地位的理想主义基础上,提出了现实主义理论的两个重要观点:1.道义是相对的,它是权力的产物;2.权力始终是政治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集中表现为强权政治。<sup>①</sup>

二次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巨变。德意日被彻底击溃,英法两国大为削弱,唯有美国未受什么损伤,反而再一次发了战争横财,侵吞了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大大增强了自己的经济实力。战后初期,美国工业生产总产值占资本主义世界1/2(1948年为53.4%),出口贸易占1/3(1947年为32.4%),黄金储备占3/4(1949年为73.4%)。美国一手拿美元,一手拿原子弹,运用在二次大战期间膨胀起来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一跃成为世界强国,走上谋求世界霸权的道路。与美国“头号强国”、“权力顶峰”的地位相适应,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就自然在美国受到特别的重视,得到进一步发展。加上二次大战期间一大批欧洲学者横遭纳粹迫害,逃亡或移居至美国(其中最著名的有摩根索、多伊奇、霍夫曼、基辛格等),短短几年内,他们就在美国云集成强有力的国际关系学者的阵容,对二次大战及战后国际问题开展全面的研究。这样,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中心就逐步转移到了美国,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出现空前活跃的局面。用霍夫曼教授的话来说就是:“卡尔最初的努力未能在欧洲扎根,反而在美国结果了。”<sup>②</sup>

战后至50年代末,现实主义理论在西方国际关系领域占据统治地位,这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最重要的发展阶段。影响最大的著作是汉斯·摩根索的《列国政治论——为权力

与和平而斗争》(1948年),这部巨著自1948年问世后到1980年作者逝世,先后再版了五次,1978年出了第五版的修订本,声誉经久不衰。摩根索逝世后,40年代作为他的学生和助手手的弗吉尼亚大学肯尼思·汤普逊教授根据摩根索的遗愿,经过四年的努力,于1985年修改出版了第六版。该书的核心是权力政治。摩根索认为,国际政治就是权力之争,国家利益只有通过权力才得以实现。他及时总结了二次大战前后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论战,第一次提出以“权力”和“国家利益”为中心内容的现实主义六原则:1.政治关系由深植于人性的客观规律所决定;2.现实主义的主要特征是以权力规定国家利益;3.以权力规定国家利益的原则是普遍适用的,任何政治行为均受其支配,这是现实主义区别于其他流派的根本点;4.现实主义并不否认普遍的道德标准,但这些标准不能抽象地应用于国家行为;5.普遍的道义法则与某一特定国家的道义要求不能混为一谈,后者与各国国家利益的差异有关;6.现实主义强调权力政治范畴的独立性,据此与别的学科(经济学、法学、伦理学等)严格地区别开来。<sup>(3)</sup>

摩根索所阐述的以“权力—利益”为轴心的现实主义原则把权力政治学说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在西方国际关系学领域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教授斯坦利·霍夫曼曾这样褒扬他:“如果我们这个学科有奠基之父的话,他就是汉斯·摩根索。”<sup>(4)</sup>

值得一提的另一部著作是昆西·赖特的《国际关系之研究》(1955年),该书不仅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发展和研究对象及方法作了全面总结,而且及时地对二次大战触发的一系列国际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被视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著作”之一。书中赖特提出国际关系研究包括十六个分支学科共四大类别:理论类、应用类、抽象类、具体类。(见表一)作者认为,国际关系理论是研究人的世界和有形世界的工具,表格中的心理学和地缘学分别是研究人和有形世界的基本学科。社会学、伦理学是心理学的延续;人口学、

技术学则是地缘学的发展。应用类的各个分支学科均是从理论类演变而来的,两者互为影响,相辅相成。

表一:

	理论的	应用的
抽象的	科学: 心理学 社会学 伦理学	哲学: 政治 殖民政治 组织 法律 经济 沟通 教育
具体的	历史: 地缘学 人口学 技术学	艺术: 战争艺术 外交艺术 对外关系行动

资料来源:摘自昆西·赖特的《国际关系研究》,第510页。

卡尔的《二十年危机》几乎是对一次大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独家总结,但二次大战后,权力政治学说已远远不足以反映更为广阔繁杂的国际斗争现实。囿于客观的限制,摩根索的《列国政治论》不可能成为战后国际关系的唯一总结,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从赖特的《国际关系研究》开始,一举冲破权力政治学的单一模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些新的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观点及方法,如国际冲突、国际安全、国际体系、相互依存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等,便随着二次大战后的风云变幻应运而生。

## 二

战后国际政治格局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两极对立(亦称雅尔塔体系),世界上出现冷战状态,原子弹又使这时期的国际关系染上了核时代的色彩。这样,国际冲突和均势,核时代的遏制冷战政策便成了战后国际关系的新的重要研究内容。

长期以来,国际冲突一直被视为理解国际

政治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二次大战以后，关于冲突的根源和防止的研究一下子热门起来。这一方面与战后美苏对峙的冷战局面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对核武器巨大毁灭力的恐惧有关，实际上是如何在核条件下防止新的世界大战问题。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肯尼思·华尔兹的《人、国家和战争》，该书发表于1959年，书中提出的关于国际冲突的三个原理，有“华氏三原理”之称：1.关于人性，人的私念、权欲是国际冲突的根源之一，所以人类只有改变这种恶性才能制止战争，华尔兹的一句名言：“恶是根源，爱是药方”；2.关于国家体制，华尔兹认为，有的国家内部社会矛盾尖锐，经济危机严重，为了转移民众的不满，增加税收，加强控制，就从战争寻找出路，所以要防止战争，就要从改善国体着手，这方面马克思、列宁关于改变所有制，改变国家制度的思想是可取的；3.关于国际体系，作者认为，国际上存在着无政府主义形态是导致国际冲突的又一原因，因为缺乏一个能阻止战争的超越国家之上的权威机构，他主张建立一个世界政府，而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应尽力维持均势的局面。<sup>①</sup>华尔兹的三原理基本上是与现实主义一脉相承的，他从人性分析出发，从历史角度考察国际政治。第三个原理则明显地受到早期理想主义的影响。当然，由于阶级立场的局限，作者尽管敬崇马列，仍不可能对战争的历史、阶级和社会根源作出马列主义的分析。

1946年初，当时美驻苏大使凯南从莫斯科发回一份长达八千字的电报，1947年7月，他又以X笔名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专文《苏联行为的根源》，论述苏联的内外政策和美国应有的对策，为战后美国冷战遏制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这篇文章及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六次演讲稿收集在1951年出版的《美国的外交：1900—1950》。凯南认为，对西方来说，苏联是敌手，不是伙伴，美国对苏联应采取“一种长期的、耐心的，但强硬的、警惕的遏制政策”。而要实行“遏制”，就必须具有“反击力量”；还需有一个先决条件：冷战，即美国要拒绝谈判

式的和解，使美苏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这样，凯南就将美国的对苏政策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成了美国战后反共的“遏制”战略的直接炮制者。另一部系统阐述“遏制”战略的专著要推约翰·路易斯·加迪斯的《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价》。此书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作者指出，美国不仅在冷战时期是执行遏制政策，甚至在出现多极缓和的变化后实质上仍是遏制。书中列举了美国五个时期遏制政策：1947—1949的战后遏制政策；朝鲜战争时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1953—1961年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的“新面貌”；1962—1969年肯尼迪——约翰逊的“灵活反应”策略；70年代尼克松——基辛格——卡特的“缓和”策略，亦称“新遏制政策”。可见“遏制”是美国战后各时期一脉相承的基本国策。

战后关于探讨冷战的文章和专著更是浩如烟海，其中有影响的如：华尔特·李普曼、亨利·华莱士和威廉·富布赖特的论文。霍罗维茨的《美国冷战时期的对外政策》，理查德·华尔顿的《冷战与反革命》，路易斯·哈利的《冷战史》，雷蒙·阿隆的《国家间的和平和战争》以及亚瑟·施莱辛格和摩根索合编的《冷战的根源》等。这些学者认为，冷战是战后的一种特殊国际现象，一般看法是始于1945年初的雅尔塔会议，至北大西洋组织成立达到高峰。而造成冷战的根本原因，一是由于战后出现两个对抗的阵营，实现真正的和平是“不可能的事”(impossibility)；二是由于核武器的出现又使新的战争成为“不太可能发生的事”(improbability)，冷战即是“不可能的”和平和“不太可能的”战争两个特殊的历史因素的产物，而拥有毁灭双方能力的核武器则是重要的条件。在核武器出现之前，国际争端不是通过和平就是通过战争加以解决，但战后情况有了变化，出现了冷战这一特殊的形式。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美苏之间的争霸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与冷战时期国际冲突有关的均势战略是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又一热门课题。

挽回霸权衰败的趋势。

### 三

体系研究是战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另一重大突破性的进展，这是二次大战注入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全新内容，与战后以联大成立为标志的国际组织发展这一特点密切相关。

根据雅尔塔会议的决定，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了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6月26日，与会的代表签署了《联合国宪章》。同年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开始生效，联合国正式成立。此后，各种国际组织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1945年10月之前，世界上重要的国际组织很少，到1980年，据不完全统计，已有政府间国际组织621个，非政府间国际组织4500个。与此相适应，关于国际关系的体系理论研究也同步地发展起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到60年代，体系理论几乎取代权力政治理论，在国际关系领域占据了优势地位。

除了世界的客观形势需要之外，体系理论的出现还有两个特殊的因素：

第一，关于国际社会的行为者。二次大战之前的传统观点是只有民族国家这个唯一的行行为者，战后不少学者打破了这一传统观点，提出多个行为者的理论。其代表人物是阿诺德·沃尔弗斯，他的名著《纷争和合作》批评顽固坚持“国家是唯一行为者”的陈腐观念，提出人（作出决策的人）和国家间或超国家组织等政治经济实体也应视为行为者。

第二，关于国际社会的层次分析法。被誉为“国际关系理论年轻开拓者”的戴维·辛格较早指出，现实主义理论的弊病之一是把国际政治与对外政策混为一谈。他认为，两者属于不同层次，国际政治是以国际体系为分析层次，对外政策则是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层次。辛格的层次分析法拨乱反正，使得国际关系理论从外交政策研究中分离出来，是战后国际关系理论最富有成果的理论之一。

多个行为者和层次分析法为体系研究提供

较早推崇均势理论的是现实主义鼻祖汉斯·摩根索。他认为，若干国家为了寻求权势所进行的争斗最终必然会导致一种称为“均势”的格局；均势格局主要表现为直接对抗和相互竞争两种模式；均势是维持和平的手段，是主权国家之间不可缺少的稳定因素。<sup>⑥</sup>现实主义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阿诺德·沃尔弗斯则强调，均势应是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外交的三个目标（自保、自延和自制）中，自保是指维持现状，寻求稳定，集中体现了均势战略。

<sup>⑦</sup>在现实主义学派中最能把均势理论贯彻到外交决策过程的当推亨利·基辛格。这位“均势大师”提出依靠均势建立一种适合美国霸权需要的“和平结构”的主张。他认为，这种“和平结构”是“外交哲学”的重要目标，而均势政策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sup>⑧</sup>在基辛格看来，原先美苏两极格局正变为多极均势格局，或称作“军事两极、政治多极”格局。基辛格把这种“多极均势”比作“核形吊灯”，认为它标志着均势理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稍后出现的传统主义学派也和现实主义学派一样，强调均势理论的重要性，认为“各国安危系于均势”。<sup>⑨</sup>

斯坦利·霍夫曼则强调，历史上出现的均势是“简单均势”，当代的均势是“复合均势”，是由美苏中日和西欧组成的一种“五角体系”，其特点是“均势在全球范围内（而不仅限于欧洲）展开；呈现为核竞争和核对峙的态势”。<sup>⑩</sup>他进而提出维持均势体系的四个条件：第一，要有五至六个实力大致相当的强国并存共处；第二，有一个中心均势结构，它有能力制止大国的扩张行为；第三，强国在某些共同的行为准则，以便能用和平方式处理冲突和危机；第四，建立一个有权威性的国际组织，以稳定国际均势体系。

至此，均势已成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国策。通过均势谋求优势，进而争夺霸权，这就是美国战后早期均势战略的实质。然而，从冷战到冷战后的国际形势变化证明了，均势战略无力为美国争得独霸世界的目标，也无力

了理论准备,使之在战后以“主力军”的面貌出现于国际关系领域。这里简要介绍一些代表性的体系理论研究成果:

- - 戴维·米特雷尼的“多元功能主义”。他提出以新的国际功能体系取代战前的旧体系,这种功能体系由技术专业性质的国际组织(交通运输、福利、卫生、贸易、工业、农业、教科文等)构成,这种功能体系不要求改变国界和主权,而采取超越国界的共同行动和措施,开展特定领域的全面合作,以促进国际和平。

- - 厄恩斯特·哈斯和肯尼思·华尔兹的“新结构功能主义”。两人在米特雷尼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最重要的是:在国际体系内,经济利益比政治义务更直接,经济决策高于政治选择;压力集团和跨国组织所起的作用日趋明显;结构功能主义不单纯是一种政治理论,而是国际关系诸理论的综合运用,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计量学等。

- - 盖布里尔·阿尔蒙德的“系统环境论”。他认为,每一个国家都处于特定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之中,国际环境对一国产生影响,一国对外政策也影响着国际环境。

- - 卡尔·多伊奇的“一体化理论”。多伊奇认为,一体化就是致力某种特殊任务的“安全共同体”。战后世界各地出现的各种共同体与“一体化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

- - 莫顿·卡普兰的“体系六模式”。卡普兰在他的成名之作《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1957年)里从宏观角度提出国际体系的六个基本模式:均势体系、松散的两极体系、牢固的两极体系、环球体系、等级制体系和单位否决体系。

- - 约翰·斯帕尼尔的“国家体系论”。斯帕尼尔认为,国家是国际社会的重要行为者,不是唯一的,其他行为者有政府间或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有关组织、共同市场、石油输出国组织、七十七国集团以及跨国公司等,但是,“国家体系论”强调以国家为中心,

着重研究一国对别国的作用和反作用。他认为国家体系的特点是权力分散,每个国家以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为目标,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均势成了稳定体系和制止个别国家扩张的主要手段。

- -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沃勒斯坦认为国家体系以国家为中心有缺陷,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一开始就是世界性的,他主张从世界体系考察分析国际关系,强调国际环境对个别国家的影响。各国的相互作用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同步发生的,应纳入相互依存的世界体系内来加以研究。

上述各种体系理论各有偏重,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二次大战期间和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增添了新的丰富多彩的内容。

#### 四

战后国际关系格局中与核时代冷战状态并存的又一个基本特点是逐步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依存趋势,有人称之为“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体制”这一趋势向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的\*\*新问题。

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老问题。在十三至十八世纪的重商主义时代,政治与经济关系密切,当时的经济领域是政治冲突的主要舞台,政治冲突往往表现为经济竞争,各国根据政治需要调节经济关系。但奇怪的是,从二十世纪初开始,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研究长期被忽视,经济逐步地被孤立于国际关系研究之外,其主要原因是当时的自由主义思潮。这一思潮摒弃重商主义时代政治与经济存在于一个统一体的传统观点,认为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应是两个彼此独立的学科。经济基础是生产和分配,受自然法则制约,经济领域存在着一种自然和谐,只有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才能保持这种自然和谐;而政治是受权力和决策等因素影响,不受自然法则制约,

也不存在自然和谐。结果，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就被人为地分割开来，经济学者忽视国际经济发展中的政治因素，国际政治学者则忽视国际关系的经济问题。

战后，这一情况起了变化。特别重要的事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会议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随之于1945年12月7日同时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1947年10月30日，联合国在日内瓦签订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至此，战后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体制”正式形成，在世界范围内开始出现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的趋势。此外，苏联与东欧国家也感到闭锁政策对经济发展是一妨碍，在经济技术方面逐渐对外开放（当然是极有限的），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带着新的经济问题和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开始走上世界舞台，它们所关注的主要政治问题也都带有经济性质，如贸易、经援、发展、对外投资和经济独立，经济发展普遍成为各国的首要目标。这样，战后国际关系格局中就出现了政治冲突和经济合作并存的奇特现象，国际经济关系重新成为国际关系的一个焦点，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东西方缓和取代冷战，旷日持久的越战宣告结束，国际经济合作进一步得到发展，从权力政治向相互依存过渡的趋势加快了，吸引着更多的学者研究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关系的新问题。他们的主要观点是：

——国际政治格局决定国际经济关系。战后两个超级大国对立的格局决定了经济体系的三重性：西方国家基于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的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美国处支配地位，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凌驾于西欧和日本之上（此情况后来起了变化）；东方体系的苏联和东欧等国家实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虽然对外有贸易往来和技术交流，但基本上是独立于西方体系的(independence)；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国家仍保持对西方体系的依赖

关系(dependence)。(11)

——政治因素更广泛地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经济政策是政治斗争的产物，如赞成低关税政策和提倡贸易保护主义均是一定政治斗争的需要，禁运成了政治斗争的经济武器，阿拉伯国家石油战争实质上是一场政治战争，外援更成了为战略利益和外交目标服务的常用的经济手段（美国的情况尤甚）。

——战后，世界逐步进入政治和经济相互依存的时代。

斯坦利·霍夫曼指出，随着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国际关系理论取得至少“三方面的重大发展”：国际体系概念、威慑理论和经济相互依存。(12)他认为，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存》(1977)是继汉斯·摩根索的《列国政治论》之后最重要的一部国际关系理论力作。该书从国际冲突与国际合作、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结合点上对相互依存作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两位学者强调，相互依存的含义首先是“相互敏感性”(sensitivity)，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发生的情况会影响其他国家和地区，如经济发展、粮食生产、人口增长、石油价格、货币稳定、生态平衡等都存在着内联性；其次是“相互易摧性”(vulnerability)，强调相互影响关系的内在因素，世界最强的两个国家——美国和苏联同时也是最脆弱、最易摧的国家，双方都拥有能一举摧毁对方的能力——核武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双方不是同生就是共灭。这一情况与战前国际关系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权力政治理论是完全不同的：（见表二）

表二：

	权力政治	相互依存
主要问题	高级政治、国家安全、势力范围	低级政治；自然资源、粮食、人口、环境、经济福利
行为者	国家（主要是第一与第二世界的国家）	国家（主要是第一与第三世界的国家）和跨国公司、国际组织
国家关系	冲突的“国家利益”	共同利益、国际合作
法则	冲突：“你得到的就是我失去的。”	合作：“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形式	双边	多边
武力作用	大	小（在被消除之前）

资料来源：摘自约翰·斯帕尼尔的《国家运用的策略》第563页。

一些西方学者宣传“相互依存”会给世界带来“和平、和谐和合作”，并奉为圭臬。果真如此吗？其实不然。就连他们中间的某些人也对此持有异议。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权力与相互依存》发表十年后再版时，对相互依存论作了重要的修正。他俩强调，相互依存并不必然导致合作，在一定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下，它也可能产生冲突。在大多数西方学者眼里，相互依存仍是以西方为轴心，仍是穷国弱国对富国强国的依赖，仍是少数几个大国支配世界政治经济，仍是维持旧的国际秩序。当然，我们并不笼统地反对相互依存。早在一百多年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多次使用“相互依存”来表述资本主义市场的世界性和生产关系的国际化趋势。我们认为，世界是一个大市场，整个世界是相互依赖的。但是，关键问题在于，我们需要的是各国尊重主权、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相互依存，我们反对侵略者与被侵略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掠夺者与被掠夺者之间的相互依存。

1976年，在美国出版了一本颇有影响的专著：《国际关系理论的现代化与变革》，作者是爱德华·莫斯。莫斯认为，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理论的现代化和变革”。他列举了如冲突与合作、一体化与相互依存、核均势与核威慑、国际体系的形成以及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等变革要素，强调这些都是二次大战为国际关系理论带来的新内容和新变化。

“历史是过去的政治，理论的实质是历史。”法国著名理论家雷蒙·阿隆如是说。二

次大战与国际关系理论密不可分。二次大战为战后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培育的土壤，而战后国际关系理论则为我们认识二次大战这段伟大的历史提供了重要途径。本文所提及的四个方面问题只是笔者的一管之见，“二次大战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一个大题目，要研究好它不是一件易事，笔者希望上述肤浅的看法能够得到同行们的指教和斧正。

#### 注释：

(1) E·H·卡尔：《二十年危机——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第21、102页。

(2) 斯坦利·霍夫曼：“美国的一门社会科学：国际关系理论”，引自《两面神与智慧神——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文集》，第9页。

(3) 汉斯·摩根索：《列国政治论——为权力与和平而斗争》，第4—14页。

(4) 同(1)，第6页。

(5) 参见倪世雄、金应忠主编的《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第122—133页。

(6) 同(3)，第173—180页。

(7) 阿诺德·沃尔弗斯：《争斗与合作》，第118页。

(8) 亨利·基辛格：《重建的世界——拿破仑之后的欧洲》，第1、217页。

(9) 肯尼思·华尔兹：《人、国家与战争》，第221页。

(10) 斯坦利·霍夫曼：“评均势”，引自《美国对外政策的新时代》第9、107页。

(11) 琼·斯佩罗：《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第1—17页。

(12) 同(2)，第14页。